



从青铜器鸟舟纹饰探索凤舟文化根脉

□ 赖晓平

在江汉平原南部的监利市与洪湖市沿内荆河(古夏水)两岸,当地人每年端午节都要举行盛大的凤舟比赛活动。这种类似于龙舟赛的凤舟竞渡形式,是其祖辈流传下来的民间传统习俗。凤舟的特殊造型全国各地都难得一见,只有在监利、洪湖两市端午节才能看到。一条条装饰华丽的凤舟,中幡上高高悬挂一只“鸂鶒”(白凤),在激烈的划船锣鼓声中,划手们挥槓击水,凤舟则如离弦之箭抢标争冠,其场面格外热闹壮观。这种独有的端午凤舟竞渡形式,在监利、洪湖交界的内荆河竞渡,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。

据史料记载,凤舟起源于远古楚人对凤鸟的崇拜,一些原始部落还将羽人划舟(凤)舟作为一种图腾标识,并铭刻在战国至西汉晚期的青铜器上。根据现代考古发现,在广西、云南等地出土的数十件战国至西汉铜鼓和青铜器上,都铭刻有羽人集体划舟(凤)舟的纹饰。鉴于这些重大发现,很多学者认为凤舟竞渡的历史,要比龙舟竞渡起源更早一些。

一、历代典籍中有关鸟(凤)舟的记述

鸟(凤)舟竞渡是一种十分悠久的群体性竞技体育,具有浓厚的集体娱乐性和竞技性。因此,凤舟竞渡是古代民间的一种大型群众娱乐活动,同时也是一项具有重要赛事意义和充满战争气息的体育运动。随着漫长的历史演变和战争迁徙等原因,凤舟竞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龙舟发展的制约并后来居上。主要原因是凤舟上面那些点缀着花枝招展的装饰,既费时又费力,而且划动时阻力很大。尽管如此,荆楚古夏水两岸的人们在两千多年时间里不厌其烦,始终没有放弃对凤舟文化的传承,并于每年端午节一定要在内荆河中,精心装饰凤舟开展竞渡。

特别是前几年洪湖市将凤舟竞渡活动,成功申报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,这种对地方传统文化传承保护行为,无疑给凤舟的前世今生注入了历史灵魂。划凤舟的历史在一些地方只是一种传说与民间沿袭,但很难在文献中找到相关历史依据。随着现代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,不但在古代文献典籍中找到了关于凤舟的史料记载,而且还在出土文物——战国至汉代青铜器上,发现了镌刻羽人划舟(凤)舟的纹饰。

关于鸟(凤)舟的考古发现资料主要有:1.《穆天子传》,它出土于西晋太康二年(公元281年),是战国魏墓里出土的竹简典籍,卷五中记叙了周穆王“天子乘鸟舟,龙浮于大沼”之事。其中的“鸟舟”,顾名思义即为装饰得类似于凤鸟的舟。晋代文学家郭璞据此作了批注:“舟以龙鸟为形,今吴之青雀舫,此其遗制者”。龙鸟在古代比喻凤凰或孔雀,凤则是远古楚人崇拜的精神图腾,而周天子所乘之舟为龙鸟舟,其装饰所采用的是百鸟之王——凤鸟的造型,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其帝王的高贵身份。2.唐代诗人张说在《岳州观竞渡》诗中描述:“画作飞凫艇,双双竞风流。低装山色变,急棹水华流。”形容一艘艘绘制鸂鶒的轻舟,如同一群在水上展翅滑翔的凫鸟,抢标健儿们在水中奋楫角逐,浪花飞溅,排山倒海。3.明代《天府广记》载:“凤舟源于远古鸟舟、鸂鶒舟,民间有凤船竞渡”。4.清朝檀萃《粤囊》记载:“龙舟以吊大夫,凤船以奉天后,皆五日于胜会,聚万金,制凤船,长十丈,阔丈三,首尾高举,以奉天后,游各水乡。”鉴此亦可证明“凤舟”在中国历代都有记述。

二、考古发现青铜器上镌刻羽人划舟(凤)舟纹饰

现代考古发掘对远古凤舟竞渡历史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佐证作用。

1.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在云南省昆明市晋宁石寨山战国古墓中,首次发现出土的铜鼓上镌刻“羽人划船”图案。

随后又在广西、四川、贵州等省相继出土的青铜器上发现了类似纹饰,其铸造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晚期。纹饰均有“羽人划船”图案,船形窄长,无桅无篷,船首船尾装饰鸟头鸟尾,船上多个人物皆带羽冠,前后排成一作划船动作。

2. 云南省广南县出土铜鼓上也有划“鸟舟”的纹饰,一叶小舟,两端翘起,船头饰凤头凤尾,船中羽人擂鼓呐喊助威,船上数个划手侧身曲肘,奋棹划舟,动作整齐划一,与现代监利、洪湖凤舟竞渡抢标场景如出一辙。

3. 1976年在浙江鄞县也出土了一件“羽人划船”纹青铜钺,经过考古鉴定为春秋时期青铜礼器。其纹饰上端有两条昂首卷尾龙纹,下面狭长的舟上坐四人,头戴羽冠动作一致,躬身划船。

4. 1983年在广东南越王汉墓中出土的纹饰铜提梁桶上,阴刻四组首尾相连的“鸟(凤)舟竞渡”图案。每艘舟上都



2012年端午节,监利县北部乡镇凤舟赛前夕,数十艘凤舟在内荆河集结。(徐祖林 摄)

有鸟饰和数个头戴高高羽冠的人物,手持兵器,动作十分有力,载歌载舞之状仿佛夺冠得胜归来。

5. 1976年广西贵港罗泊湾出土一件“羽人划船竞渡”纹小铜鼓,两组羽人分别坐在凤头舟和龙头舟上,头戴椎髻奋力划船,经考古鉴定该铜鼓为西汉时期文物。

凤是中国古代楚人的图腾标志,它源于商代人对玄鸟(凤凰)的崇拜,并是楚文化的象征。凤舟竞渡作为一种楚人崇凤的文化活动,抑或是战争需要在水上训练的项目,故凤舟竞渡被楚文化赋予了抢头争先的拼搏精神,一鼓作气的涅槃重生意志。凤舟文化随着历史上三苗南迁,中原部落将龙图腾带入三楚之地,于是龙舟竞渡在中国端午节便占据了主导地位,并逐渐赋予了纪念性质,以致现在全国各地仅有极少数地方,还保留有划凤舟的传统习俗。如:四川广元市始于唐代纪念“武则天乘凤舟”的女子划凤舟竞渡活动,历经千年仍在有序传承。而更为巧合的是最近在乌兹别克斯坦一处唐代遗址中,发现了“武则天乘凤舟”的壁画。

远古时期,作为“九头鸟”的楚人把凤视为神鸟,并将其赋予了能“浴火重生”的文化寄托。特别是在水上竞渡运动中,更是对凤舟寄予了战无不胜的信仰。而凤舟竞渡曾经一度活跃在古老荆楚大地上,并早已成为了楚文化深厚的历史文化符号。随着历史长河的浪涛千年冲刷,凤舟文化色彩被渐渐淡化,直到今天,可万幸的是两千多年后,中国西南与东南边陲出土的青铜器上,还深深印着鸟(凤)舟竞渡记忆。这其中的历史缘故与荆楚“三苗”部落南迁历史,有着密不可分的文化联系。

三、禹伐三苗至凤图腾部落南迁

三苗部落是新石器晚期至夏商时期,生活在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些原始人类联盟,如:“荆楚”“荆蛮”“南蛮”等部落。其后裔主要对应现在的苗族、瑶族及畲族等南方少数民族。根据考古学揭示其先祖与屈家岭文化、石家河文化有密切关联。三苗部落历经了尧、舜、禹三代征伐,因“丹水之战”“三苗于三危”之后,中原部落又对长江中游三苗部落实施了更加强大的军事打击,致使三苗被迫向西南崇山峻岭迁徙,最终在黔、桂、滇等地区形成文化延续,并在青铜器上铸刻祖辈崇拜的凤文化经历。

凤是楚人共同的精神图腾,三苗部落对这种神鸟十分信仰,舜帝南巡至三苗之地,被其浴火重生的文化现象深深感动,遂以《韶乐》“有凤来仪,鸾凤和鸣”感化三苗部落,使之放下武器,结束敌对,实现了华夏民族南北和平。凤舟作为荆楚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,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,始终象征着智慧、坚韧和顽强拼搏。现在湖北省监利、洪湖两市少数乡镇至今还保留端午节凤舟竞渡习俗,这是楚人后裔对先祖文化的坚守。虽然长江、汉水对荆楚文化进行了几千年大浪淘沙,但根植在楚文化灵魂深处的凤舟竞渡,始终没有脱离荆楚子孙的记忆。虽然传说中的凤舟文化有些扑朔迷离,但那些时过境迁的青铜器铭刻,始终为凤图腾后人留下了永恒的凤舟竞渡画面与历史佐证。

因此,凤舟竞渡并不是现代人空穴来风的臆想,而是实实在在的有迹可寻的古老楚文化传承。虽然三苗部落南迁至黔、桂、滇等地,离荆山楚水相对遥远,但共同的风文化基因确一脉相承。据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人著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记载:“鸟舟始于三苗”“陆事寡而水事众”。这种记述为凤舟发源地定位,水事活动繁多的荆楚之地提供了历史依据。特别是1976年广西罗泊湾出土的西汉“羽人划船竞渡”铭纹小铜鼓,画面上的两舟头部分别饰一凤一龙。这足以证明凤舟与龙舟竞渡,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成为了一种竞技体育文化风尚。也许这些画面记录的是凤图腾部落

与龙图腾部落,将各自的凤舟和龙舟作为部落战船在水中激战的场面。

四、凤舟在江汉平原走向衰退的原因

江汉平原是长江中游与汉水流域交汇的冲积湖沼平原,这里历史悠久,文化沉积丰厚。据现代考古发现,在监利市白螺、柳关,洪湖市乌林、沙湖,仙桃市排湖等地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这些四五千年前的文化遗迹因水患变迁而沉埋淤塞。考古工作者还在瞿家湾附近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墓葬,同时在洪湖中间也发现了很多宋代以前墓葬。因此可以证实千年之前,洪湖水域很多地方是江汉流域中心的内陆之地。据《尚书·禹贡》江汉篇载:“九江孔殷,沱潜既道,土梦梦作。”指当时位于洞庭湖、鄱阳湖之间的沱江、潜江等水系已得到了治理。另据《诗经·周南·汉广》:“汉有游女,不可求思,汉之广矣,不可泳思。”足以证明早在两三千年前的江、汉之地并不是一片汪洋,而是一片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人文厚土。

凤舟作为具有悠久楚文化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,曾经广泛存在于荆楚大地,随着漫长的历史演变,凤舟竞渡逐渐退宿到监利、洪湖的内荆河(古夏水)流域。自南宋以来,龙舟竞渡作为官方推崇的端午节形式并使之一舟独大,而将凤舟竞渡地域化和边缘化。另外,由于凤舟竞渡长期受封建礼制“男尊女卑”约束,古代女性不能抛头露面,更不能参与各种公共活动,从而严重影响和削弱了凤舟竞渡的平等地位。另外凤舟制作成本要比龙舟高昂,这也是制约凤舟发展的重要原因。1. 凤舟船体宽大,比赛速度较窄长的龙舟缓慢。2. 凤舟装饰物繁多,中舱竖立桅杆,桅杆中间嵌双层天幡,顶端悬挂一只用白布覆扎的鸂鶒(白凤),一根根满彩旗的绳索从桅杆上连接凤舟头尾。这些华丽装饰对凤舟行进速度也会产生很大影响。

由于古人对大规模凤舟赛事祈求安全,故非常注重祭祀。每年凤舟竞渡公开赛至结束都要举行:“造舟、祭舟、下水、竞渡和凤还巢”等仪式。如造舟、祭舟词:“过端阳、造凤船、有请鲁班老神仙。伐来昆仑佳木,正好造作凤船。凤头昂起高万丈,凤尾翘起遮青天。黄道吉日,风平浪静,又请来神仙点睛,凤舟下水闹龙门。二十四对红花女,挥棹划水两边分。一敲锣、二打鼓,凤凰展翅水上舞。”下水、竞渡词:“五月楚水划凤船,鸾舞凤飞水中央。锣鼓手舟中站,红颜佳人排两旁。金钗玉臂齐挥棹,仙女列阵来下凡。你追我赶争头筹,飞凫戏水闹端阳。”凤还巢词:“五月端阳夏水边,河里划起凤头船。凤头船儿真好看,比翼鸂鶒闹江滩。两边坐的娇娇女,花轿好比鸾翅舞。年纪不过一十八,玉纱笼住黑头发。个个纤细窈窕身,赛过画中观世音。鼓咚咚、锣强强,看客人人蹦蹦跳,划手个个争夺标。桂冠一舟独抢到,满河凤船随水漂。岸上放起得胜炮,难舍难分凤还巢。”

综上所述,凤舟竞渡是江汉平原一种非常悠久的传统文化。很多学者认为凤舟文化源于长江、汉水及洞庭湖流域,是楚文化的先行者与龙舟文化的启迪者。目前,由于凤舟竞渡活动受到各种条件限制,如制作凤头、凤尾、斗幡和鸂鶒鸟的老艺人们相继离世,凤舟制造成本过高,凤舟竞渡区域十分局限。仅有江汉平原监利、洪湖部分内荆河流域偶划凤舟,根本不能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地方传统文化特色。因此,希望地方政府要加强对传统文化保护,组织专家学者深度挖掘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,用充分的史料,众多的文物和凤舟竞渡历史文献,来提升凤舟文化的自信。文化部门要积极组织开展凤舟竞渡活动,使之成为有故事、有特色、有影响的重要传统文化赛事,让荆楚凤舟文化早日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,使凤舟文化传统也能像青铜器一样,永久活态保护好荆楚优秀历史文化根脉。

文史漫谈

楚共王临终前为何请求降低自己的谥号

□ 余大中

公元前560年,楚共王熊审病重之际,向群臣提出请求,在他死后,谥号为“灵”或“厉”。这两个均属春秋时期典型恶谥的称谓,似乎与楚共王在位三十一年来的政绩形成了强烈反差。对此,也引发了后世学界对其行为动机的持续探讨。笔者综合相关文献,从三个方面予以简要论述。

其一,以退为进促成公允评价。有文献认为,楚共王请求恶谥,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。因为他深知,谥号的最终议定权掌握在朝臣手中,主动提出极端负面的谥号选项,反而能引导朝臣客观权衡他的执政功过,最终拟定符合实际的公允谥号。

维基百科《楚共王》条目明确指出,春秋时期国君的谥号由朝臣根据其生平事迹共同议定,君主生前的自定意愿仅供参考,不具备最终效力。楚共王作为资深君主,主动请求恶谥的行为,可能是充分利用规则,来引导朝臣的评价方向。

据《左传·襄公十三年》记载,楚共王去世后,大夫们最初主张,遵从遗命确定恶谥,但是令尹子囊反驳道:“赫赫楚国,而君临之,抚有蛮夷,奄征南海,以属诸夏,而知其过,可不谓乎?”最终确定谥“共”。“共”(通“恭”)在谥法中为美谥,意为“既过能改”“尊贤贵义”。这一谥号,既认可楚共王的政绩,也肯定他的自省态度,正是对其功过的公允评价。

有当代学者认为,楚共王即位初期,就主持过地十一国会盟,使楚国声势达到顶峰;楚共王推行休兵息民的政策,通过盐业贸易与土地开发,增强了国力;楚共王安抚蛮夷,征伐南海,扩大了楚国疆域,并推动了中原与南方的文化融合,等等,这些功绩足以支撑“共”谥的合理性。

其二,对执政过失的深刻自省。有文献认为,楚共王请求降低谥号,源于自身执政生涯的过失,是一种真诚忏悔与深刻反思。纵观楚共王的一生,始终以恢复父亲楚庄王的霸业为己任,却因为自身能力与客观条件的限制,最终导致了霸业的中落,尤其郢陵之战惨败,让楚共王深感愧疚,临终以请求恶谥,承担责任、践行自省。

据《左传·襄公十三年》记载,楚共王明确对大夫们表示:“寡人没有德行,年幼的时候就做了一国之主,生下来十年先君就去世,没有来得及学习师傅的教训而蒙受了太多福泽,因此缺乏德行而在郢陵损失了军队,让国家蒙受耻辱,让大夫担心,这都够严重的了”。这段自责,是楚共王忏悔的核心内容:年幼继位缺乏治国历练、郢陵战败辱国辱民、丢失楚庄王的霸业。

公元前575年,郢陵之战惨败是对楚国霸业的致命打击。值此一战,楚共王本人被晋将魏射射瞎了左眼,司马子反因为醉酒误事自杀,最终楚国失去了对中原的控制权,导致晋国重新确立霸权。可以说,郢陵之战是楚共王的一生遗憾,是无法释怀的痛点,用一句俗话说,是他肠子都悔青的恶梦。

楚共王执政期间,出现的权力困境,也加剧了他的自责心理。楚共王小小的十岁年纪继位,在比较长的时间,国政由子重和子反两个叔叔掌控,二人因为专权,导致楚国人才流失,比如申公巫臣叛逃晋国,还进而引发吴国崛起,使之成为楚国的劲敌。这些,虽然不是楚共王直接造成的,但作为国君,他深感责任就在自己。所以,在临终前以恶谥自贬,这也体现了楚共王仁厚自责的性格。

其三,以自贬警示后世继承者。有文献认为,楚共王请求恶谥的行为,具有明确的政治警示意图。他通过主动接受负面评价,是向后世继承者与朝臣传递一种警示:“霸业不易、失德致败”。由此,督促继任者(儿子楚康王),吸取教训、励精图治。同时,希望以此凝聚朝臣对楚国霸业的责任感,扭转楚国中落的国运。

在中华民族历史上,谥法起源于古代的西周,其核心功能是“惩恶劝善”,通过对逝者生平的褒贬评价,来引导各位生者的行为。据《逸周书·谥法解》的明确界定,“灵”为“乱而不损曰灵”,“厉”为“戮杀不辜曰厉”,均属典型的恶谥。有文献认为,楚共王选择这两个谥号,可能是利用谥法的教化功能,以自身作为反面教材,用来警示后人。

楚共王执政时期,楚国经历了从楚庄王霸业顶峰,骤然到中落的大幅度转折,不仅在中原争霸中败给了晋国,还面临着吴国的持续侵扰,由此导致国内统治基础产生了动摇。有文献认为,楚共王以恶谥自贬,能够激发朝臣的危机感和使命感,督促他们辅佐新君,重振国威,这一行为的本质,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动员。

有学者认为,楚共王临终请求恶谥,还与他的“埋璧定君”行为一脉相承。楚共王曾经通过埋璧占卜的方式,来确定自己的继承人,体现了他对楚国未来统治稳定性的深切关注。临终请求恶谥,也是为了保障楚国长远发展。埋璧定君侧重于权力传承,临终请求恶谥侧重于精神警示,都是为了实现楚国中兴的梦想。

总的来说,楚共王请求降低谥号,源于先秦时期各国君主的政治责任担当,符合周代“礼治”文化中君主的道德自律传统,也是楚国霸权衰落时期的一种政治智慧。楚共王试图为继任者楚康王铺平治国中兴的道路,同时折射出谥号制度在周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。这一历史片段,引人深思。作为经典案例,已经被后世多重新解读和反复征引。

翰墨荆楚(65)



意諧獨有清風共 事少緣無俗容來
作者 黃文泉